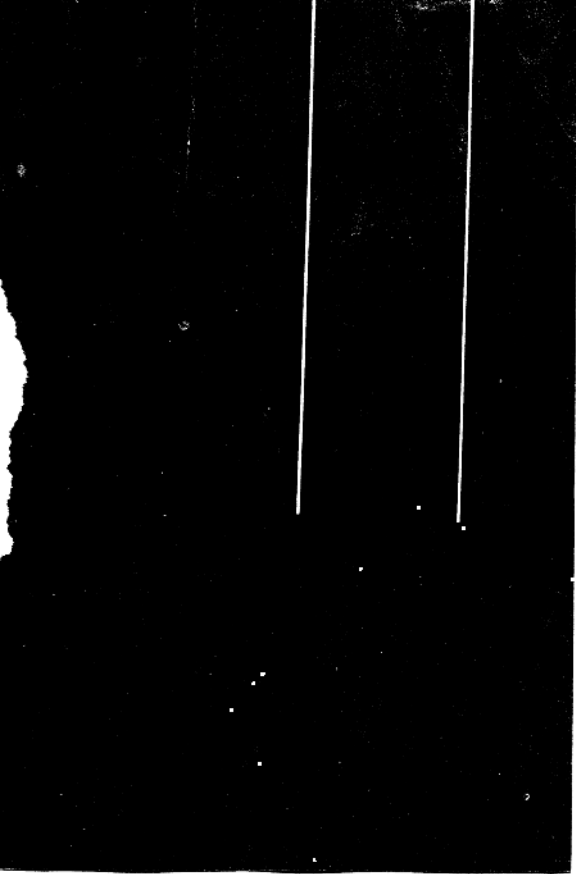


夏含渠 陈 澧 著

湘 茗 文 存

XIANG MING WEN CUN

辽宁大学出版社





顾奎相 1939 年生于辽宁省岫岩县，1965 年于辽宁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先后从事新闻和教学工作，现任辽宁大学副校长、历史学教授，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兼任辽宁省历史学会理事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理事、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学会理事、辽宁省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辽宁省委省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沈阳市对外交流促进会副会长等职。主要致力于改革史和史学史研究，著作有《司马光》、《中国古代改革家》（合作）、《中国古代改革史论》（合作）、《亚洲史上十大改革》（合作）、《（资治通鉴）选读》（合作）、《中国史学史讲稿》（合作），主编《改革理论探索》、《势在必行》等著作，另有学术论文 30 余篇。

陈 澹 1941 年生于湖南省安化县，1965 年毕业于辽宁大学历史系，从事教育工作十余年，1978 年调入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从事专业研究工作至今，现为历史学研究员，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业研究重点是明清史和中国改革史，主要著作有《皇太极》、《中国古代改革史论》（合作）、《中国古代改革家》（合作）、《亚洲史上十大改革》（合作）和《萨尔浒之战双方兵力考辨》、《论代善的历史地位与作用》、《论努尔哈齐改革与女真族社会变革》等论文数十篇，还参与撰写《清代人物传稿》、《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卷》等书多部。

书 墨 缘

——代自序（一）

生命之树的年轮增加了一圈又一圈，我们不觉早已两鬓染霜。半生有余，蓦然回首，少年时的梦幻、青年时的追求、壮年时的奋斗历历在目，虽平凡，却也实实在在做了点事情。我们不约而同走了同一条路，各自于诸多兴趣中独得与书墨结下不解之缘，年年月月，笔耕不辍，至今已留下近四百万字墨迹。除已面世的《中国古代改革家》、《中国古代改革史论》、《亚洲史上十大改革》、《皇太极》、《司马光》、《北魏末年各族人民起义》等拙著外，还有百余篇文章散藏于书橱、纸笺间，一点心血，敢帚自珍，为免日久尘污虫蛀、散佚难寻，今搜集汇总，经分类、筛选，编辑成册，付梓以存，名之曰《湘岩文存》。

“湘岩”者，湖南、岫岩之谓也。1941年4月12日，陈浣降生于湖南省安化县一个山村里，而一年多以前（旧历1939年11月初9日），在北方辽宁省岫岩县的一个山村里，奎相已经来到这个世界上。虽然天南地北，却在命运之神的安排下相会在沈阳，在辽宁大学历史系，同窗五载，对书墨的共同兴趣使我们走到了一起，结为伴侣，学海共涸三十年有余矣。专业上的一致，兴趣上的认同，性格上的互补，使我们成为事业上最相投的合作伙伴，时以“沈湘岩”、“湘岩”为我们的合作成果署名，其意不单是两人乡籍的简单组合，更含有我们共同跋涉书山学海时彼此都深切体会到的那种契合的意义。我们的合作没有主次之别，没有你我之分，是真正意义上的合作，不用说合著的篇章是如此，即使是独撰之文稿也有多篇是共同揣摩的产

物，从创意、构思到推敲、润色，勒定成篇，往往都是各自发挥所长、经切磋商定的结果。故此，这个集子就以“湘岩”名之，且集中各篇都不分别署名，就让“她”作为我们的书墨姻缘永久的纪念吧。

集中收入最早的文章是我们发表在1964年的处女作——《植棉史话》，其余八、九十年代作品为多，受“文革”影响甚深的作品也略有选入，如《李贽》等。此次编辑过程中，除个别文章内容上较原发表时有所补充之外，其余绝大部分文章都只将印刷讹误予以校订和划一书法，基本上都一仍原貌。记得好像是鲁迅说过，就如人们把自己幼时光着屁股咬手指头的像片都收入影集，而不嫌其幼稚一样，编辑文集时将早年的作品也都收入。我们也效法先贤作如此处理，除有关改革史的论文、教育学论文、散文和一些恐有版权之讼的文章舍却不收之外，这次辑录几乎尽搜我们之所有，以留湘岩学步之足迹。

我们治学为文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研究领域宽，文章体裁和文字风格多样。从时间范围看，几乎整部中国通史的各个时期都曾涉足；从专史范围来讲，政治史、史学史、农民战争史、改革史的内容都有。至于体裁和文字风格，有严肃的论说文章，也有通俗的知识短文；有考订史实的专门文字，也有少许史学理论探讨文章；还有关于治学方法的议论和书评及介绍文字。这一特点在这个集子中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一特点的形成和我们的经历、工作条件、治学思想乃至兴趣有很大关系。

社会科学是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理论的科学，它的这一性质决定了它自产生之始就是一门具有强烈的时代性的科学，所有这一研究工作都不能游离于现实的时代之外而进行，否则，它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因此，密切关注现实社会的发展之需要，使理论研究服务于这一需要，是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职责。这是我们的认识，由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努力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探索一些与现实密切相关的史学理论问题，除系统研究改革史

之外，这个集中收录的《论近代思想家对‘君权神授’说的批判》、《革命不能没有旗帜》、《‘治天下要文武相资’》、《择人而治，政之大本》、《评判历史的唯一标准是历史实际》、《试论农民起义领袖不是皇权主义者》等文就是这样一些具有明显时代性的文字，从中可以看出我们置身现实社会发展潮流之中，跟随时代前进的脚步。

历史学是一门实证科学，从史实的考订辨析、史料的爬梳整理弄清历史真象，以说明一个问题、提出一个观点，是史学研究必不可少的基础工作，所以，我们的研究当然地在这方面着力甚多，集中所收《萨尔浒之战双方兵力考辨》、《袁崇焕诛毛文龙辨析》、《袁崇焕与辽东战局》、《论代善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石廷柱事迹及家世辑考》、《王尔烈史迹与传说辑考》、《佟养性卒年考》、《〈清史稿·列传〉正误举例》、《魏晋南北朝史学繁荣探源》等即此类文章，文中所考所述多前人所未发、所未言，提出一点独见。

湘岩治史，尤钟情于历史人物，因为历史是人创造的，是一个个面貌、性情、才干各异的人物创造出一部异彩纷呈的历史，人物于历史研究之重要不言而喻，而且，一个个生动的面孔在历史舞台上演出一出出活剧，又极具研究的诱惑力。故我们在这方面的文章也较多，便将其单列一类，似更明晰些。

此外，我们还时应编辑之约，利用一些零散时间，写了多篇知识性、趣味性短文，诸如《压倒三江王尔烈》、《养其习于董蒙》、《丞相与儿子》、《苏东坡智胜辽使》、《咏菊风波》、《正史·野史·别史》等等，这些小品虽难登大雅之堂，然活泼有趣，且往往寓意较深，读来轻松而有益，启迪人心智，陶冶人性情，有如滴滴珠露，故亦放入集中，约略可窥湘岩兴趣之一斑，也是我们严肃文墨生涯中的一种调剂。

文集一般按文章发表时间顺序编排目次，但因内容杂，文风异，为避免有散乱之感，故按文章体裁和风格粗分三类，曰

《史论篇》、《人物篇》、《琐语篇》。

湘岩虽大半生情系书墨，然亦不敢奢望此集能流行于世，只自置于榻侧、案头，闲来翻检浏览，回味学海汨流的酸甜苦辣，得长以与书墨的这份情缘为慰。再者，湘岩治学为文，也曾多得领导、师长、尊亲好友和同仁故旧的关心、支持、理解与帮助，今成此集，自当将这枚果实恭奉各位共享，版表寸心，亦恳请指教。

自80年代以来，为改革大潮所鼓动，湘岩愿在这时代的最强者中汇入一份绵薄之力，故专意执着于改革史研究而不及其他，虽韶华已逝，又天性愚蒙，然当此盛世，壮心不已，为完成既定目标——《中外改革史书系》仍将日作不休，有生之年，得与书墨长相厮守，于愿足矣！

家严陈光崇教授是资深历史学家，湘岩与书墨结缘离不开他的影响与教导，湘岩的成长是他的期望，欣然应邀为《湘岩文存》题写书签以留念，亲情深意，湘岩永志不忘。

一九九五年七月二十九日于嫩江街新庐

我的治学历程和感想

代自序（二）

大凡敢谈治学经验者，当是著述颇丰、名气甚大之人，而我，在治学上虽有投入，但产出不多，收效微微，实无资格侈谈经验，不过，吃过梨子，自然知道梨子的滋味，也就不揣谫陋，欣然应本书策划者之邀，谈谈自己治学过程中的些许感想，于人，或可使后生学子稍得启示；于己，也算大半生学海涸辙的一点总结。

在不断认识的过程中，我逐渐领悟到一条较为清晰的道理，即对世上任何一件事情进行研究的时候，要能有近乎准确的把握，必须研究其背景，探讨其过程，不然，对研究对象只能知其然而不能知其所以然，更难以揭示其特色。故而治学之方法必与不同人之不同治学经历和治学背景有关。不知道一位学者的身世、经历、际遇等等，就难以把握那些各具特色而又交相映衬、自有千秋的治学方法和道路。基于这样的理念，我想从我的学习和治学经历谈起。

我国古代著名史学家司马光说他于史学“自幼至老，嗜之不厌”。我在史学的天赋和成就上绝不取自比先贤，但对史学的酷爱却从孩提时代就已开始，至今半生有余，仍一往情深，毫无倦怠之意。

一般说来，史学大师们自幼爱好史学，或因家学渊源，或因师承关系，或有高人指引，我则与这些都无缘，说来近乎滑稽，我竟然是在一个近乎“史盲”的环境里同历史学结下不解之缘的。或者也可以说，是我们这个古老的文明国度里深厚的

史学土壤无形中培育了我这颗无名的种子。我们民族有特别深厚的爱好历史的传统，我们悠久的历史通过戏曲、口碑等多种形式在民间广泛地世代相传，即使是在文化落后的穷乡僻壤，也会受到特殊的历史传播方式的薰染，我就是在这种特殊形式的影响下由向往而走进史学王国的。

1939年的隆冬，我出生在辽宁省岫岩县北部的一个山村，名叫顾家村。顾名思义，这里多数村民都姓顾，而且，在我远祖的时候，顾氏家族还有些时势。不过，到我祖父时，家道就已衰落。我出生的第二年，父亲谢世，母亲领着我们四个孩子艰难度日。母亲是个农家女，不识字，和那个时代许多穷家女子一样，连名字都没有，娘家姓田，就随俗称为顾田氏。贫瘠山乡，孤儿寡母，幼小的我自然无从吸取文化的汁液。终日所见，是在山山岭岭之间的沙石地上劳苦谋生的农民们，真是“此地偏僻无音乐，终日不闻丝竹声”，记得我在十岁之前，乃至16岁小学毕业之前，充满两耳的除鸟语虫鸣、鸡啼犬吠之外，不如音乐为何物，没看过电影，也没碰到过能讲述三皇五帝、秦砖汉瓦、唐宋宋祖的饱学之士。就在这样贫薄的文化氛围里，是大鼓书和皮影戏这种民间文艺形式把我引向历史殿堂的。

那时，每到“挂轴”和过旧历年时，邻村有位双目失明的王老先生来村里说大鼓书，我被那些《大八义》、《小八义》、《七侠五义》、《空城计》、《孙二娘开店》等故事迷住了，生动曲折的故事情节和侠肝义胆、武艺高强的英雄人物吸引着我，饭都顾不得吃，跟在说书先生屁股后面跑，他说到哪儿我跟到哪儿，他说到什么时候我就听到什么时候。有时散场了，还舍不得离开，想方设法缠着先生问“且听下回分解”后面的内容。对皮影戏的痴迷也不亚于大鼓书。那些历史故事不仅让我着迷，也使我一片白垩似的头脑里画上一连串的问号：“这些都是历史上的真事吗？还是说书人瞎编的？”“飞檐走壁”、“蝎子倒爬城”、“万夫不挡之勇”的英雄到底有没有？就是这些问号成为我向往

学习历史最初的动因。我10岁那年，新中国成立了，孤贫的我得以上了学，上了学的我便很自然地立志将来要学习历史，把那一连串的问题弄清楚。回想起来，竟是大鼓书和皮影戏把我引向扑朔迷离的历史世界的。

1955年秋季，我考入离家百里外的岫岩一中，来到了约有三万人的县城，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见到“大”城市。汽车、商店、饭馆、剧院、工厂、清真寺，……这一切对一个山村少年来说都是新鲜的，饶有兴趣的，但历史依然如一块巨大的磁石强烈地吸引着我。初中毕业，我升入本校高中，不久，实行文理分科，我毫不犹豫地进了文科班。回忆初、高中五年的学习生活，我突出的爱好有四点：一是爱上历史课，这是我用力最勤、也学得最好的一门课；二是最爱看历史读物，《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都是在高中前读完的；三是爱同历史老师接触，给我们讲授历史课的是刘日岩老师，我记不清曾问过他多少问题，只记得他是我印象最深的一位老师。今年（1995年）一中八十周年校庆，向我征集回忆文章，我就以《难以磨灭的记忆》为题，回忆了这位恩师；四是爱去的地方是京剧院门前。京剧院在学校北面，几乎每天都上演京剧，晚饭后去京剧院门前走一走，几乎成了我的习惯。虽然我没有钱买票看剧，但我也总要去读读剧院门前水牌上的剧目，什么《空城计》、《华容道》、《杨八姐游春》、《陈州放粮》、《铡美案》、《三岔口》等等都一一记在心中。碰得好，就钻看门人疏忽的空子溜进去看上几眼。

中学时代，对历史的痴迷已不再是沉溺于那一连串“有没有”的问题之中了，而是在老师的引导下，开始懂得了一些最粗浅的道理，知道了历史并不是单纯的故事，而是现实的一面镜子，可以鉴古知今，历史上有许多宝贵的经验，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可少的知识。认识的提高增进了学习的自觉性，高考报志愿时，我没有征求任何人的意见，在志愿表

上清一色填写的都是历史系。当我接到辽宁大学历史系的录取通知书的时候，那份高兴真是从未有过的。至今，我对自己当初的选择也无怨无悔！

大学五年，是我夙愿得偿的五年，面壁发愤的五年，也是我对历史的执著追求发展到一个更高境界的五年。这里要提到的是：我和同班同学陈浣结成了伴侣。她的父亲是历史学教授，家里有很多历史专业书籍，她本来爱好文学，但父亲希望她继承父业，她便遵从父亲的意愿，报考了历史系。和她的结识使我对历史的追求目标更明确了，当在她家看到那儿架专业图书的时候，我的眼前一下子明亮了许多。翻看着那些书，我感到我自幼的憧憬能够脚踏实地地实现了！陈浣是一个专心学业的人，我们的结识增强了共同献身专业的力量，我们携手在学业上攀登。

概括起来，我在四个方面进行了全力投入。一、紧跟授课老师讲的内容，辅之以必要的参考书和报刊资料，认真学习中国和世界两门通史，对中国和世界历史进程有较清晰的把握。二、在较广泛涉猎的同时，把主要精力放在中国古代史上。为了学好古代史，对古代汉语、历史要籍用力甚勤，为研究古代史扫清阅读上的障碍和掌握要领。三、广泛搜集和研究名人治学经验。至今，我还保留着当时的剪报和卡片资料。众多先哲对“史”与“论”、“博”与“约”、“点”与“面”、“古”与“今”、“天才”与“勤奋”等问题的论述，成了我当时学习乃至后来治学的良师益友。四、练习写作和思考问题。大学四年级时，《沈阳晚报》发表了我们的处女作——《植棉史话》。

大学毕业时，我希望留校或到研究部门从事我心爱的专业工作。然而，1965年的政治气候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为“防修反修”，大学毕业生几乎全被放到基层锻炼，其中一部分是为培养省、市、县、社四级接班人，去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作为一分子被分配到朝阳地区社教工作团。正要当

“官”“接班”之时，被“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当作“修正主义苗子”革掉了，我被分配到朝阳日报社当了记者和编辑。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之时，这场“革命”又是从史学界开刀的，我这个学历史的“年轻小将”自然便派上了用场。一个历史爱好者或研究者一般都对这个专业有着深厚的感情，研究历史人物，大都客观地评价他们的功过，可“文化大革命”之风一起，历史突然完全被扭曲了，许多在历史上有过贡献、应当肯定的人物都成了批判对象，对此，我百思不得其解，心中萦绕着莫名的悲哀。因此，尽管革命的号角吹得震耳欲聋，我也无意和无能为其冲锋陷阵了。

不过，不幸中之大幸，我又同历史书相伴了，我可以堂而皇之地翻看历史书了，原来报社图书室的二十四史从无人问津，我借批判之名搬出来摆到办公桌上，随意翻检。大学时，就知道有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没能读到，这时，也为了批“大毒草”，从头至尾，逐字逐句读了多遍。“大毒草”《燕山夜话》是在1963年，我因喜欢它知识丰富、文笔活泼，不顾囊中羞涩买下的，但未及细读，被批判以后，我正好借机仔仔细细阅读起来，从中学到许多新的知识，比如《扶桑小考》、《中国古代妇女节》、《谁最早发现美洲》等篇章带给我不少学校课本之外的知识，《不求甚解》、《多学少讲》、《贾岛的创作态度》、《杨大眼的早读法》、《不是秘诀的秘诀》、《大胆练习写字》等篇章拓宽了我的治学门径和方法。特别是作者把掌握的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灵活地运用自如，用一个生动的标题或一个哲理和观点统起来，再用生动的文字描述出来，简洁明快，生动活泼，读来不忍释手。这种文章风格对我影响不小，后来我写过一些类似的短文和随笔，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书。

到“批林批孔”和“批儒评法”的时候，我更忙了。毛泽东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要研究。一般来说，一个人的精力很难作到这点，也不会这么去做。我那时年轻，精力充

沛，又在“四人帮”的淫威之下，就拼命跟着跑（确切地说是跟着学），说“孔老二”是“复辟狂”、“顽固派”，是儒家的祖师爷，我就读《论语》、《孔子世家》等；说吕雉、武则天是法家，我就读《汉书》、《新唐书》；说李贽是大法家，我就翻《明史》和《焚书》，等等。在大家公认的蹉跎岁月，我在学业上好像没怎么蹉跎，反倒抓住了一个很好的读书机会，几乎没有星期天。不过当时多是学而不写，“述而不作”，除了记者要尽一般的宣传报道之责外，真正写的文章只有两篇，一是同妻子合写的《李贽》（1975年2月辽宁人民出版社《法家史话·四》），二是独自写的《三国时期著名科学家马钧》（1975年5月辽宁人民出版社《中国古代科学家史话》），此外，还同妻子于1976年初合作完成了一本小册子《北魏末年各族人民起义》（1978年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至今还感到庆幸的是，虽几经“焚书”和搬迁，还把五个纸盒箱子的历史书籍和讲义、笔记完好地保存了下来，当时，这是顶着压力的。有一天，驻报社工宣队长在我家闲聊，留心到我那小书架上的书目，当时没说什么，在第二天的编辑部大会上，他严厉地批评说：“书架上摆满了帝王将相，毛主席著作摆上了吗？”幸亏我也是“革命依靠对象”，还没把我怎么样。不过，我也不得不按照他说的原则将书架上的书调整了一下。不怨此举也有意外的好处，有的书因收藏而长期保存下来。大学时，李宗邨先生给我们讲史科学，油印讲义《中国史科学》我一直保存着，随我东奔西走二十年。李老师沉冤昭雪后，因他是著名的历史文献学专家，多家出版社向他索取史科学讲稿，可惜他的书籍、文稿都早已荡然无存，他向学生寻访，也一无所获，我听到这一消息以后，将我保存的讲义完好无损地送给他，李老师激动得老泪纵横，说不出话来。我也为自己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而无比欣慰。

“四人帮”覆灭的次年，我告别辽西，奉调到辽宁省委主办

的《理论与实践》杂志社任编辑。此时的沈阳，同全国一样，晴空万里，到处是一派拨乱反正的可喜景象。我的心情也同所有“老九”一样，都有摆脱精神枷锁，获得自由的轻松感。同时，亡羊补牢，挽回损失，繁荣学术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油然而生，我根据党的政策，刊物特点，结合改革的实际，充分发挥史学为现实服务的功能，从1977年8月至1981年8月，先后发表了《苦战能过关》、《唐太宗与贞观之治》、《评判历史的唯一标准是历史实际》、《治天下要文武相资》、《论近代思想家对‘君权神授’说的批判》、《革命不能没有旗帜》、《历史上的宋金战争》、《论中国农民起义领袖不是皇权主义者》等论文，我没有辜负学术的春天这大好时光！但是《理论与实践》杂志是理论刊物，主要是进行政治理论和现行方针政策的宣传，我虽为文史编辑，也不可能做冷静、系统的史学研究工作，只能是在编务之余，作点“古为今用”的文章。尤其是改革不断深化，政策不断调整，宣传思想日新月异，刊物就得跟着跑，有时跟不跟跟，逼使我的研究工作只好是游击战，不能打阵地战。战线太长，内容太杂，难出高水平的学术成果，于是我毅然决定告别十五年“无冕之王”的记者生涯，回到辽宁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任教，时在1981年12月。

几经曲折，我终于实现了大学毕业时的愿望，登上了大学讲堂！又适逢盛世，有较为宽松的学术探讨环境，更增添我科研的勇气和激情，我立刻全身心地投入了教学和科研工作。根据教学需要，我讲授中国古代史和中国史学史，科研重心定在两宋史学和两宋政治史。

由十几年的新闻工作转入教学和科研工作，以往具备的条件有利也有弊。其利有：一是长期从事记者工作、有较好的文字表达和归纳概括功底；二是新闻是最好的现代史，充分了解现代，有助于把握和认识古代；三是对中国历史有比较宽泛的宏观认识，利于在一点、一段上切入和突破。不利处是对宋代

史籍读得不多，对两宋史总体把握不够。在这种情况下，我以多出成果、快出成果为目标，充分发挥我的优势，努力克服我的不足，集中精力，如饥似渴地读《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和两宋的笔记资料。研究的切入点是司马光和《资治通鉴》，很快取得一批成果。1985年4月，出版了《司马光》一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10月，与陈光崇教授合著《〈资治通鉴〉选读》（山西人民出版社）；还参编了《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版）和教材《中国古代史》、《中国史学史讲稿》（1985年辽宁大学出版社）等。同时发表了《论谏官司马光》、《“庆历新政”天折的思考》、《〈宋史〉述评》、《魏晋南北朝史学繁荣探源》等论文。

正值我的研究工作有条不紊深入推进时，研究环境突然发生变化。1986年5月，我出任校长助理，次年任辽宁大学副校长，分管文科教学和科研，以及国际交流等诸项校务。做管理工作以后，由于历史遗留问题甚多，加上管理体制、办学条件、财力不足等等问题，使工作量和难度大大增加，即使把精力全部投入冗繁的校务当中，也难以全部奏效。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对待已经完全进入角色的专业研究工作呢？放弃吗？不能。一是从感情上难以割舍，二是工作上也需要。我认为一个称职的大学校长首先应该是专业领域里的知名学者，其次才是个有奉献精神的管理专家，二者缺一不可。只要科学地设计、规划、调整，利用睡眠以外的一切时间，在保证完成分管工作的同时，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继续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处理得好，二者不是相互掣肘，而是相互促进。为此，我在妻子的支持下，调整了研究方向，变史学史为改革史，因为史学史研究难以直接介入现实社会，而改革史是宏观研究，较为贴近我的管理工作和社会急需，实践证明，这一调整是正确的。改革史的研究受到了社会多方面的关注，既于现实社会改革有一定意义，又于我的工作有所启迪。关于这一点，因与本

文主题关系不大，略去不书。这里要说的是广泛深入的改革现实加深了我对改革史的理解和认识，利于出成果。十年间，围绕改革史主题，我和妻子合作先后出版了《中国古代改革家》、《中国古代改革史论》、《亚洲史上十大改革》三本书，发表了《中国古代改革成败论》、《简述忽必烈改革》、《改革失衡与三国倾斜》、《三国鼎立成因新探》、《商品经济与高校体制改革》等论文。我还主编了《改革理论探索》、《势在必行》两书，这些研究成果面世后，颇有社会影响，特别是《中国古代改革史论》出版后，有《光明日报》、《史学集刊》、《中国图书评论》、《文摘报》等十一家报刊发表书评，誉为中国改革通史研究的“开拓之作”、“奠基之作”，提出了对中国历史发展新的“认识模式”。1993年，我晋升为教授，同年，荣获国家特殊津贴。

目前，我正同妻子再接再厉，要把改革史研究推向高峰。我们主编了大型丛书《中外改革史书系》，凡30本，1000万字，礼请国内外致力于改革史研究的专家通力合作，预计本世纪末，全部奉献给波澜壮阔的改革时代，为改革大潮推波助澜。

以上所述，是我简略的治学历程，从中可见我的治学有三个明显特点：一、对历史科学有执着的追求，不论何时何地，何种环境，我都没有放弃对历史的学习和研究。二、从1965年大学毕业至今整整三十年，从事新闻工作十五年，管理工作十年，纯搞历史教学和科研是五年。显然，我的专业研究多不是主业，而是业余，除五年时间是专心于历史教学和研究之外，其余都是在正业之余挤时间进行的。三、工作三十年，做宣传、教学、管理三件大事，我是结合本职工作和当时的历史实际进行史学研究，故使我的治学具有方面多、涵盖面广和时代性鲜明的特点。

此三点，一般地说，除第一点利于治学外，其余两点都不利于做学问，时间少，战线长，可以说是从事历史科学研究的大忌，弄不好，专业爱好会被挤掉、抛掉，但我没有。我充分利用了后两

点中利于治学的一面,使治学兴趣不断升华,直至开花结果。到目前为止,我自撰著作一本,二人合著五本,主编三本,参编两本,发表论文40余篇,读史随笔、杂记、书评几十篇,计210余万字。同学富五车、著作等身的前辈学者相比,我自愧不如,但这些作为我没有虚度年华的记录,是我莫大的慰藉。

我的治学经历,对戴过“老九”帽子和经历过“脱胎换骨”改造的学者们来说,不算特别,但对连遭盛世的青年学子来说,这样的际遇不会很多,但也不会绝对没有,因此,我还想谈点感受,想来不会是毫无意义的。

第一,要挤时间。这虽是老生常谈,但我体会颇深。做学问,当然都要多读书,但研究历史,这一点似乎更突出。因为历史是一门实证科学,离开史实,就没有发言权,而史籍浩如烟海,即使同一件事,也往往众说纷纭,非遍览典籍、穷根究底,无以知其究竟,所以研究历史,阅读量很大,用时最多。而我的治学条件,恰恰缺的就是时间,我的时间从哪来呢?只有挤。《中国古代改革史论》出版后,《改革之声》杂志的记者采访了我们,他写的《为改革而著述的顾奎相、陈澧夫妇》这篇报道中有一段可以说明这一点,他是这样写的:

“为了尽早完成改革史研究项目,这一切都只好舍弃不顾了。他们抓紧一切可利用的时间。春天,窗外明媚的春光是多么大的诱惑啊,可他们硬把自己关在房里写作,须臾只能到阳台上望望远树的新绿,也算是休息休息脑筋;炎炎夏日,伏案窗前,一手笔不停地挥,另一手扇也不停地扇;寒冬灯下,暖气峰后,室温逐渐下降,他们一直工作到双脚冻得冰凉才上床休息。四年中,他们夫妇俩没有过一个完整的节假日,连每年春节都很少出门,把应酬也都摒有了。当然,他们还不可能杜门谢客,不过,每当听到楼梯上脚步响时,他们就会自然而然地神经紧张,唯恐有人造访,等听到来人进了邻家,才松了口气。甚至两人偶而一起做饭的时候,也一边做饭,一边讨论问题。”